

◎文化大家

10月19日,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将在中国公映。该片由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5个“金砖国家”的5位电影导演,分别以“时间去哪儿了”为主题拍摄一部电影短片,汇集成一部集锦式长片。5位导演通过自己的精巧构思讲述了5个充满着爱与生机的故事,题材和风格各异,却都在时间主题下殊途同归地展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此前,该片曾于今年6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上作为开幕影片亮相。

中国导演贾樟柯既是整部影片的出品人、监制,也负责执导中国部分的短片。本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和本报文艺部联合推出的“文化大家”栏目对贾樟柯进行了采访。

金砖五国导演合拍《时间去哪儿了》 贾樟柯：我们创造了历史

□本报记者 苗春

“这个项目使我充满了探险的乐趣”

记者：《时间去哪儿了》是金砖五国电影人合作的成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时间去哪儿了”这个概念又是如何诞生的？

贾樟柯：去年秋季，金砖国家电影节联系我，问我有兴趣拍金砖五国导演联合拍摄的电影。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4个国家都是电影创意的大国，俄罗斯有传统的苏联学派，影响了电影史，每年都有好电影诞生；巴西是南美电影最活跃的国家；印度的宝莱坞也很有创造力，电影产量非常高；南非我们相对陌生一点，但是也有非常好的导演享誉世界，我们却不是了解他们的作品。这就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四国导演合作，通过合拍片的形式和其他四国的电影工业结合的机会，我觉得充满了探险的乐趣。如果我们能做同题创作，寻找到一个共同的生活感受，由5个国家的导演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阐释、拍摄，贡献我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智慧，在美学上一定会是一种五彩斑斓的局面。所以这个项目极大地吸引了我。

记者：这5个国家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作为电影的出品人和监制，您做了哪些工作？

贾樟柯：对我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大家生活状况的相似性。这5个国家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而这种快速的变化一定对个体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诸多的创意里面，“时间去哪儿了”的创意得到五国导演的一致认可。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现在的科技、经济和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我们匆忙的生活，家庭关系、亲情关系、男女爱情都因此有了新的改变，所以引起了五国导演的共鸣。

作为监制，对于不同文化我持保护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将这叫做和而不同。我既要寻找和的地方，找到共同点，又要保护所有导演不同的部分，鼓励大家不同类型、不同方向的创作。所以这部电影的类型很多元，每个国家都用了不同的形式，巴西导演拍的是灾难片；俄罗斯电影是惊悚片；印度电影是亲情片，有歌舞元素；南非电影走得更远，它用科幻题材来表现时间。我的短片也结合了武侠片和爱情片元素，里面还有一些幽默的地方。

真实的情感状况最动人

记者：您的片子《逢春》有些内容是关于“二胎”的，这个话题是当下社会的关注热点，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题材的？

贾樟柯：“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我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正好是处在这种年龄，大部分人有了一个孩子，年龄处在一个临界点，努力可以再生，不努力可能一两年之后就过了生育的黄金阶段。所以，一方面“二胎”政策激活了社会，让大家的生活有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其实选择也是有些困难的，比如对年龄的顾虑，特别是女性。我觉得处在这样一种选择关头的时候，人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个剧本其实是在讲，一对夫妻表面上是想再生一个孩子，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他们开始重新关注自己的情感，两夫妻可能已经有些淡漠了，但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他们重新燃起爱的渴望和激情。这是最终电影叙事的主体。

记者：“二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您觉得这部电影在“走出去”时，会不会遇到文化价值上的冲突？西方电影主流声音是不是认为中国电影还停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上面？

贾樟柯：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几十年来，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很多中国和外国人的国际交往和人员流动，我觉得外界并不存在对中国太多的误解。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输出各种各样的影片，也能展现中国当代生活，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另外，因为过去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二胎”的背景很多海内外人士都了解，这个政策得到调整之后，人们基本上都理解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担心在传播上有什么障碍。最感染人的其实是真实的人的情感，当外国人接触到中国人真实的情感的时候，他就会感动。

五国导演合拍电影开创了历史

记者：在您看来，这部集锦式电影的意义在哪里？

贾樟柯：6月份在成都的时候，电影放完我上台跟观众见面，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开创了历史的，因为第一次有5个国家的导演一起来拍电影，确实是电影史上首次。另外，借这部影片的拍摄，五国的制片公司、五国的电影工业进行了一次深度亲密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开创了历史的。作为中国导演，我能加入其中感到很骄傲。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初的创意是习主席提出来的。他在印度果阿开会的时候提出，金砖五国可以试着去合拍影片。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创造历史的机会。

精彩语录

△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我想是来自情感。我最近又恢复了手写剧本的习惯。有时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支笔，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是有一种情绪，可能是生活给的，也可能是我个人生活带给我的，也可能是一种时代的情绪。慢慢地梳理，人物形象出现了，故事也就出现了。

△电影的生命力在于表达的热情。只要我们还存在一批导演对我们的生活有感



《颤抖的大地》(巴西) 沃尔特·塞勒斯执导



《呼吸》(俄罗斯) 阿列斯基·费朵奇科执导



《孟买迷雾》(印度) 马德哈尔·班达卡执导



《重生》(南非) 贾梅尔·奎比卡执导



《逢春》(中国) 贾樟柯执导



人物小传

贾樟柯,1970年5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市。导演、监制、作家。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要电影作品包括《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和《山河故人》等。曾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洛杉矶影评协会最佳外语片及最佳摄影奖、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导演双周单元终身成就“金马车奖”等。

现担任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CIS-AC)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2016年,创办全球电影短片中国内地首映平台“柯首映”。2017年10月19日至26日,发起创立的平遥国际电影节将在山西平遥举办。

记者：您用“五光十色，一片丹心”来形容这部电影，“五光十色”比较好理解，“一片丹心”的含义是什么？

贾樟柯：“一片丹心”就是所有的导演制作人员专注、认真的态度。大家彼此都是同行，互相之间都非常欣赏，大家一起做事情，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比如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他是享誉国际的大师级导演。他剪辑完影片之后，发了几次小样给我看，精益求精，我觉得就是“一片丹心”。我自己也是这样，虽然只是20分钟的短片，但我在山西平遥古城拍了3周，精耕细作，希望把它拍到最好。

留下自己的时间刻度

记者：您自己产生过“时间去哪儿了”这种感慨吗？

贾樟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晒旧手机，我也翻出了我的一些旧手机，一看，感觉这就是一个时间的线索。再比如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拍电影拍了19年，我的记忆都是按电影来的，哪一年我拍了哪部影片。我差不多是以两年为一个周期来拍一部电影，所以我的回忆都是围绕时间坐标找作品，19年拍了十几部电影，时间就过去了。

记者：除了拍电影，您也在做电影节方面的工作，这次您想留下怎样的时间刻度？

贾樟柯：平遥国际电影节即将举办，我们把它定位为3部分，一是介绍非西方电影，比如东欧电影、南美电影；二是希望通过平遥电影节，把中国电影像西方电影一样进行推广；第三，我们强调这个行业需要年轻导演加入，提供给他们一些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整体上是小身段大格局，所谓小身段就是选片量不会太大，差不多每年40部，大格局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专业化的学术贡献和梳理。现在大量的文化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但是中小城市、农村也需要文化资源，文化流动起来，整个社会才能达到一种艺术资源、文化资源的公平的分配。

“我从第一部电影就‘走出去’了”

记者：针对中国电影“走出去”，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贾樟柯：中国电影产量特别高，但有时候国际社会得不到我们年轻导演的作品的信息，因为信息太多了，800部影片无从选择。平遥电影节就希望通过推荐，让一些有价值的影片出现在国际视野中。另外，过去艺术电影比较容易走向世界，但实际上更大众化的商业电影也应该走向世界。商业电影其实也是强调电影美学、电影语言的。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有大量的商业片，我们的人选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质量还有待提高。所以我们今年平遥的电影展特意做的是法国新浪潮之父同时也是类型片之父、警匪片的开山鼻祖——梅尔维尔的回顾展。借此让我们的电影工业提高认识，商业电影其实也是有质量要求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浪潮？

贾樟柯：我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走出去”了。中国电影“走出去”，我觉得还是要创意“走出去”，而且应该是自然地走出去。现在电影“走出去”有一些乱象，比如两个留学生找个地方办个影展，邀请几部中国电影。电影确实是放了，但是它没有征服观众。我觉得真正的“走出去”就是要征服观众。

(孟申哲、姚丽娜、张雪、张少鹏、胡洁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还有勇敢精神,还可以直面生活,还可以把生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五味都能有强烈的表达,这就是电影一直往前走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不是资本。

△中国的电影工业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人才奇缺。我们长期电影的产量是200多部,积蓄的导演、摄影师、制片人、道具等的容量也只能支撑200多部电影拍摄。但是只用了几年的时间,我国的电影产量就一下涨到800多部,人才是不够的,有很多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新手进了这个行业。过去是师傅带徒弟,慢慢培养,现在没时间培养,来了就干活。这确实是要改变的一个事情。(整理/张雪 张少鹏)

翻译成为使者

□纳杨

◎墙内看花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读者,他们渴望通过文学这一具有精神共性的载体,了解中国,走近中国,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也为世界各国读者提供了一种新鲜独特的人生体验。可以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双向的需求。当前,整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调整期,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走出去”,需要通过文学作品中对中国中国的描绘和反映,通过其中蕴含和展示的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去发挥文学这一历史弥新的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理解,助力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自信,收获显著,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获得星云奖等各文学领域的国际著名奖项,卡夫卡奖、法国文化艺术功勋章骑士奖等有影响的国际文化类奖项中也相继出现了中国作家的身影。这些奖项是对获奖作家的认可,也相继体现出中国文学开始走进国际主流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专家学者们反复讨论,那就是翻译家的作用。莫言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其译者葛浩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葛式译法在翻译界引发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是葛浩文对作品作出的改变已经超出了翻译的界线,也有人认为各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不同,适当的改写可以使作品更易于被接受。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翻译在其中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得到一致认可的。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获奖,译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译者刘宇昆本身就是一位在美国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家,他的翻译可以更好地把作品中的科幻因素展现出来,使作品在语言上更贴近英语科幻读者。

正是因为看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近年来,各类针对翻译的资助纷纷设立,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出版的数量大大增加的同时,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显。一是文学作品翻译的难度和译者的欠缺。文学作品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要求译者有高超的语言能力,更要求译者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仅限于英语、法语、俄语等大语种,也要重视瑞典语、捷克语等在世界文学中较有影响的小语种,特别是要重视在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出版。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文学翻译严重缺乏。这些语种翻译出版中国文学大多是从英文版本翻译的,很少从汉语直接翻译。比如埃及,能够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翻译家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的需求,何谈翻译数量和质量。二是翻译家与本国出版社的关系不太乐观。有的译者翻译水平不错,但找不到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很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但找不到合适的译者。

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翻译这个环节,一方面积极发现和联络更多优秀翻译家,一方面要重视对本国出版社有一定影响力的翻译家,特别是在本国读者中有影响力的翻译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发挥好他们的桥梁作用,让他们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读者之间的使者,使中国当代文学能够被翻译、被出版、被阅读、被讨论,真正走进各国读者的阅读视野中。

现实题材轻喜剧《越活越来劲》

反映大众真实生活

□海文

在日前举办的2017秋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都市轻喜剧《越活越来劲》以贴近现实的原創故事、反映百姓大众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亲民视角与轻松幽默的喜剧表达,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越活越来劲》由嘉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徐正超编剧,刘流担任导演及领衔主演,该剧还汇集了闫学晶、范明、修睿、张璇、乔杉、于洋、王君平等喜剧演员,共同演绎城镇小市民嬉笑怒骂的日常生活。该剧讲述退休工人季德发和钱福云二次创业、二次婚恋的故事,以“夕阳红”的“二次”人生为主体事件,融入青年情感、亲情危机、都市奋斗等热点话题,描绘当代人奋力拼搏、精神富足的真实状态。

不管大银幕还是小荧屏,从口碑和观赏效果来看,喜剧无疑是收视群体首选的题材之一。《越活越来劲》在现实主义故事内核的基础上,采用喜剧手法,以最易被观众接受和传播的方式,表现时代生活,传递真实的社会状态。演员的表演和台词都隐含着幽默又富于启迪意义的小话题。该剧请来众多喜剧创作人,不仅为原創故事聚集了更多智慧,也将提升观众的收视兴趣,为“电视中国剧场”的品牌建立和人才培养作出探索。



《越活越来劲》剧照